

2014年12月28日 星期日 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叶凡

镇江晚报

铜

文/张明军

铜这个东西,现在人人都不知为何物了。

铜有很多种,与之有关的行业或是匠人就有木匠、瓦匠、铁匠、补匠、铜匠。什么样的匠人用什么样的铜,什么样的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。铜多数为铁质的,也有铜质、铅质的。铜有的很大,身長愈尺,有的又很小,铜匠用的铜得用镊子才来撵起来。铜的用途很广泛,瓦匠砌房、木匠造船、补匠铜陶瓷器具、铜匠修手炉汤壶,都要用到它。

过去造房子是没有钢筋水泥的,家境殷实的人家是青砖小瓦。清末民初,大户人家的房子讲究三房两厢、天井雨廊俱全。这种房子的墙体都是小而结实的青砖砌就,用以黏合砖块的是糯米汁拌石灰。按说这种墙是十分牢固的,但主家还是要求瓦匠在两端的山墙上各打上几个铁铜。这种铜的样子就像一个放大的中括号,一般的一尺多长,铜背两头狭窄,中段稍宽。往墙体上打铜对于防止山墙走置固然有益,但也不排除是当时的一种时尚:墙上带铜,这是一户殷实而考究的人家。

木匠用铜基本上都是造船或修船。那时候农村用的几乎都是木质的船,要造一条新船,除了筹备好所需要的木材,还得到铁匠铺打很多铜。船体钉好后,在用麻丝拌油石灰勾缝之前,要在船底、船帮等处钉上长短不等的铜。钉这些铜时它的两端要分别钉在相邻的两块木板上,这样木板才能更加紧凑,不易散板。上铜前都要往铜上涂几遍黑色的防锈漆,新船竣工后,油黄的船体、乳白色的船缝、黑色的铜,色彩鲜明,十分的俊美。修船是一样的道理,起旧换新。可以说,给船上铜就是给它加了一道保险。

补匠在修理陶瓷器具时所用的铜就小多了。那时候的农家有很多的陶瓷器具,有盛米的大缸、腌菜的坛子、放鸡蛋的陶壶、炖猪食的瓦罐,这些破损了,家里一般是不扔的,他们

要等补匠来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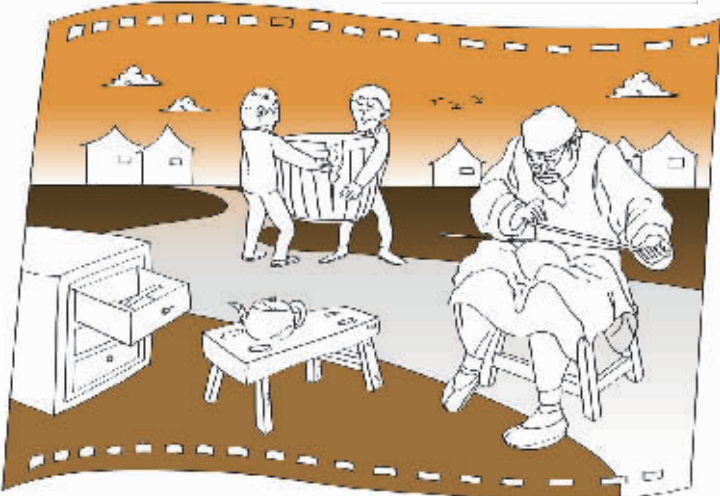
补匠是当时的一种职业,一般都是家传。补匠好像专门修补陶瓷物件,他们在修补前总要很认真而细致地察看裂口,反复将破损的裂片与坏了的器具拼斗,直到严丝合缝了,才将裂口处擦拭干净。然后,他会用一个很精巧的手工打眼,谚语“没有金刚钻,不揽瓷器活”说的就是这玩意。补匠在打眼时和木匠不同,要不停地往打眼的地方添注明矾水,这样才不至于将要补的器具和裂片弄碎。眼打好后,他便用长度相宜的铜将器具和裂片固定好,再在铜钉和裂缝处涂上特制的黏合剂,这样一个破损的陶瓷物件就修好了。物件是否修好最后当然得检验一下,方法很简单,往器具里倒满水,不漏了才算合格。修好后的物件真难看,裂缝的地方就像是一条蚂蟥爬在上面,用当地人的话说,疤疤铜铜的。尽管如此,他们还是舍不得扔掉,将就着用。

同为修补者,这里的人把修补陶瓷物件的叫补匠,而把修补金属制品的叫铜匠。补匠的技术含量不太高,所得的报酬也就很有限。陶瓷制品本就不值什么钱,人们当然不会花太多的钱来修补它。但金属制品就不一样了,无论是铁器还是铜器,相对于陶瓷要贵重得多,不得不修补。修补金属物件需要较高的技术,也极费时间,铜匠的收入比补匠高是理所当然的。铜匠修补得最多的是铁锅、铅桶、搪

瓷盆和水壶等物,到了个村子后,他会找一处向阳的杓儿,着手修理。铜匠总有一副担子,担子一头有很多的小抽屉,里面装着各种质地的金属片、圆钉、铆钉、锡团、钢剪、铬铁等杂物,另一头是一个小火炉和焦炭。得知村子里来了铜匠,家里有需要修补金属物件的就会把东西拿来,铜匠会按先后顺序排好。修补东西并不要现等,到了收工来取回便是。

补匠和铜匠不像木匠和瓦匠做生活有预定,他们是云游者,是做行脚生意的。他们的报酬也很有意思,一般人家给现钱,也有人家视价钱多少回家量一两升米或给几个鸡蛋的。但是再穷的人家都不会赊账,觉得手艺人也要吃饭,都不容易。虽然他们和瓦、木工一样都是早出晚归,但没人管饭。每到中午饭点,他们会拿出一个黄烧饼或半块“酥头定”(一种经发酵做成的面饼,极熬饥),向邻近的人家讨一碗热水将就着吃下。也时常有妇女看到补铜匠忙了半天中饭还没着落,便回家盛一斗碗菜饭掺几筷老咸菜送给他吃。看到他手捧菜饭吃得喷香,她也挺高兴的。

铜是连接和固定两两分离物件的纽带,有时候它把人与人的情感也连接在一块了。



插画\郑海仑

镇江方言解义 79

文/王川

六国 八国

镇江方言里有两个有趣的词,一是六国:“你看你,神气六国的!”二是八国:“我都忘到八国里扣了!”这些都是什么国家?值得这样经常挂在嘴边?

看似随口说的几个国家,其实都有出处,而且出处还相当远古。“六国”是指战国时的纵横家苏秦,以合纵来游说赵王,结果被六国聘为相,身佩六国相印,率领六国,扣关攻秦,这就是“神气六国”的来历,这六国是: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。而“八国”则是虚构的,是指除了战国七雄之外的另一国,当然是乌有之国。“忘到八国里去”,那就是说一点也记不得了,因为第八国是不存在的。

我的从医生涯

文/吴尔蓉

每次走进医院,那微带药味的清爽空气,都让我有说不尽的亲切感。

参加工作以前,我是一名乡村医生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作为插队知青随父母下乡,担任生产队的会计,干得很起劲。

1974年冬天的一个傍晚,我忙完一天的工作回家,书记站在我家门口,有点难以启齿地说“有事和我商量。”“想另外给你安排一个工作。”

那时农村还很贫困,极度缺医少药,我所在的大队是个偏僻山区,离最近的集镇也有十多里地。村民们生了病只能“小病挨,大病埋”,尤其是妇女生小孩,老法接生贻误了许多产妇和新生儿的性命。公社要求每个大队必须配备一名女赤脚医生,推行新法接生。书记顾虑我还是个没出嫁的姑娘,怕我不愿接受这又“脏”又有风险的工作。

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书记感到很意外。他高兴地安排我赶紧交账,准备参加公社医院办的学习班。

我背着行装去接受我从未涉及过的医疗培训。

一进医院的门诊大厅,一股来苏儿的气味扑面而来,我莫名地感到一阵紧张。这时内科室内走出一位中年女医生,她问我是来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吗?和蔼可亲的态度,让我的情绪平静了许多。她是我后来的一位老师,姓冯。是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儿科医生。

会议室里坐满了女赤脚医生,都是农村妇女,知青只有我一人,没结过婚的也只有我一人,引来了大家好奇的目光。一位身材高大,白白胖胖,面带笑容的女医生站在讲台上,她姓戴,是妇产科医生,这次学习班是她负责培训。

我们上午上理论课,下午实习。在这里我学会了新法接生的操作,简单的内科,小外科,护理(打针,输液),中医针灸,中草药的认识和运用等技术。

我第一次在老师的指导下接生,亲眼目睹产妇临产时的痛苦。婴儿出生时的过程,真称得上惊心动魄,深深地体会到母爱的伟大。当我亲手捧着那个呱呱坠地的小生命时,觉得这一过程是那么圣洁和动人,我的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,有什么工作比迎接一个新生命来到世上更神圣和高尚呢?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。因为人多,实践的机会少,我和几个离家远、住在医院里的人就讨巧多了,我们轮流和医生一起值班,整个晚上都是实习的机会。

中医许医生,出生于祖传中医世家,医术高超,温文儒雅,待人谦和,是个令人敬重的老者。他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中医理论,手把手地教针灸手法,还亲自带领我们去十多里外的山区采药,现场让我们认识、采集、制作中草药。

冯医师是盐城医专毕业的,戴医师毕业于南京医学院,她们响应当年“四个面向”的号召,来到农村的基层医院。从风华正茂的青年一直到中年,在这个乡村医院里奉献自己的青春,她们以精湛的医术,高尚的医德,和蔼可亲的态度,服务广大的普通村民,也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。她俩是我青年时代的良师益友。

三个月后,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朝夕相伴的老师和同伴,回到大队开始了赤脚医生的工作。

